

国际政治科学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二〇〇五年第四期（总第四期）

- 冯惠云 防御性的中国战略文化
- 漆海霞 国际斡旋的成败分析
- 韦宗友 霸权阴影下的战略选择
- 钟振明 冷战后北约何以继续存在
- 刘 丰 张睿壮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辨析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际政治科学

2005 年第 4 期(总第 4 期)

主办单位: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学术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田中明彦(东京大学)

江忆恩 (Alastair Iain Johnston, 哈佛大学)

沈丁立 (复旦大学)

张睿壮 (南开大学)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

柯庆生 (Thomas J. Christensen, 普林斯顿大学)

贾庆国 (北京大学)

秦亚青 (外交学院)

阎学通 (清华大学)

编委会:

主 编:阎学通

执行主编:陈 琪

组稿编辑:孙学峰

同行评议编辑:周方银

文字编辑:张盈盈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新斋 246 室

邮政编码:100084

电 话:010-62788801 010-62786457

传 真:010-62773173

电子信箱:iis@mail.tsinghua.edu.cn

作者简介

冯惠云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师,1994 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获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2002 年和 2005 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分别获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学,代表作有“Crisis Deferred: An 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 of Chinese Leaders Across the Straits,” in Stephen G. Walker and Mark Schafer, eds., *Beliefs and Leadership in World Politics* (Under contract with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电子信箱: huiyun.feng@asu.edu

漆海霞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生。2000 年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2003 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获硕士学位。

电子信箱: qhx03@mails.tsinghua.edu.cn

韦宗友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师。1998 年南京大学历史系国际关系史专业硕士毕业,2004 年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毕业,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理论、美国国家安全与战略。

电子信箱: wzy82@yahoo.com

钟振明 同济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师。2003 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毕业,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美欧联盟关系和国际安全问题。

电子信箱: zhongzhenming@mail.tongji.edu.cn

刘 丰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硕士研究生。2004 年南开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本科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研究兴趣为国际关系理论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电子信箱: liufeng00@mail.nankai.edu.cn

张睿壮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1997 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对外政策与中美关系、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电子信箱: rzhang@nankai.edu.cn

编者的话

中国战略文化的性质是分析和预测中国对外政策取向的重要依据。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江忆恩提出“中国战略文化是进攻性文化”的论断,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文化上的理论依据。冯惠云的《防御性的中国战略文化》考察的核心问题依然是中国战略文化的性质,但提出了与江忆恩完全不同的判断。论文通过分析中国现代战争中领导人的心理决策过程,认为中国战略文化是防御性的文化。论文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借鉴了政治心理学的行为代码分析,即以决策人的公开讲话为研究对象,通过计算机对文本中动词进行量化分析与对比,分析并预测决策人的战略文化取向,从而使研究结论具有扎实的实证基础。

参与斡旋国际冲突的第三方,其斡旋策略成败的条件是什么?这是漆海霞的《国际斡旋的成败分析》一文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作者将斡旋策略分为三类,即直接改变收益策略、信息明确策略和程序改变收益观念策略。论文应用博弈分析发现,如果冲突双方投入的资源接近,则第三方采用任何一种策略都容易成功,但程序改变收益策略效果最佳;如果冲突双方投入的资源差距较大,则三种策略的效果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具体而言,直接改变收益策略最容易成功,信息明确收益策略次之,程序改变收益观念策略效果最差。根据这种研究发现,作者提出中国要想使朝核六方会谈取得更大成功,可以采取两种对策:一是减小冲突双方的实力差距;二是综合使用程序改变利益观念策略和直接改变收益策略。

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面对霸权的威胁时,国家趋于制衡霸权,但国际关系中许多国家的行为与这种理论预期发生了较大的偏离。韦宗友的《霸权阴影下的战略选择》对这一现象做出了解释。该文认为,面对霸权威胁时,体系内的其他国家可能有制衡、追随和不介入三种政策选择,制衡并非国家的主导战略。影响国家行为选择的因素包括五个,即无政府文化结构、体系格局、国

家间的权力对比、地理位置以及决策者观念。通过对战国时期诸侯兼并战争的详细考察,作者指出,正是在上述五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秦国最终才能够消灭六国,建立起“大一统”的帝国。

冷战后,北约的延续和发展成为现实主义理论批评者否定该理论的主要依据。钟振明的《冷战后北约何以继续存在》则提出,现实主义理论仍然是理解和解释冷战后北约得以延续的有效理论工具。作者认为,北约主要大国的安全利益需要决定了美欧联盟关系和北约组织的延续。北约成员国都相信,如果完全抛弃美欧之间的联盟关系,将导致各自面临更为不利的环境。对于美国来说,维持美欧联盟关系既有助于美国在国际结构变动过程中获得维持稳定的力量,又可以借此长期延续美国的单极霸权。而对于欧洲盟国来说,北约组织不仅提供了协商建设新的欧洲安全机制的论坛,同时可以确保美国继续对欧洲承担义务,防止欧洲内部重新出现竞争性的安全政策。

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现实主义的内部论争问题,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可以遵循,学者们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分类存在着较多含混、交叉之处,影响到了学术交流和研究的深入开展。刘丰和张睿壮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辨析》力图理清现实主义的发展脉络,重新划分现实主义的流派。作者提出,从分析层次的角度划分,可以分为人性现实主义、国家中心现实主义以及体系中心现实主义三类;根据研究范围区分,可以分为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对外政策理论,当前各自代表性的理论分别是新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从对国家动机的假定区分,现实主义可以区分为进攻现实主义和防御现实主义。与当前较为普遍的分类方法不同,作者认为进攻/防御两分法应该在新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类之下进行讨论。

最后,编者要感谢一位极具热心和负责精神的读者,他来信指出我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个别段落与其他期刊文章中的某些段落严重雷同。经核实确有其事,在此我们向批评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就我们编辑工作的失误向读者表示歉意。今后我们将扩大匿名评审范围,改进编审程序,提高杂志学术质量。坚持科学精神是我刊宗旨,欢迎广大读者和国际政治学界同仁随时对我刊的问题和缺陷提出批评和建议。

防御性的中国战略文化

冯惠云

越来越多的人在讨论中国崛起的世界影响。在这些讨论中,有两种理论视角值得我们关注,即结构现实主义和文化现实主义。信奉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学者认为,中国会如以往的大国一样,通过领土扩张达到国家崛起的目的。中国将在未来挑战美国霸权,以武力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最终试图通过战争改变国际体系现状。因此,即使目前中国的国力还不够强大,但崛起的中国仍是未来国际体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必须现在就加以遏制。信奉文化现实主义理论的学者则强调中国战略文化对中国外交决策和国家战略的影响。他们指出,中国有人文儒家和极端现实主义两种战略文化,但前者在中国战略决策中不起决定作用,极端现实主义文化(Realpolitik-Parabellum Realism)才是中国战略文化的主要特征。在极端现实主义文化的驱动下,崛起的中国将会成为未来战争爆发的焦点。虽然两种理论分析中国崛起影响的角度不同,但却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中国崛起将挑起战争,现在就必须开始遏制中国。

在批评以上两种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利用政治心理学中的行为代码量化分析方法提出了“中国战略文化防御论”的观点。所谓行为代码分析,是以决策人的公开讲话为研究对象,通过计算机对文本中动词进行量化分析与对比,科

《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总第4期),第1—23页。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学地分析、预测决策人的战略文化取向。通过分析中国领导人在战争与和平状态下的信念体系变化,本文认为,中国的战略文化为防御性,中国领导人的外交决策倾向于维持和平,而非挑动战争。

全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结构现实主义和文化现实主义理论有关中国崛起的主要观点,剖析两种理论的缺陷和不足。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战略文化理论在国家战略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并提出论文的主要假设——中国战略文化防御论。第三部分介绍政治心理学中的行为代码研究方法。第四和第五部分分别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和平和战争环境中的行为代码进行量化分析,以检测本文的研究假设。第六部分是结论部分。

一、两种现实主义理论的主要缺陷

作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旗帜,现实主义理论有很多分支。本文主要分析为西方“中国威胁论”提供理论依据的两种现实主义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和文化现实主义。

结构现实主义强调国际体系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沃尔兹(Kenneth Waltz)的新现实主义理论、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和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霸权更替理论。^①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体系内的每个国家都要依靠自助的方式保障安全。要生存,就要保存实力,因为实力的大小是国家间的主要区别。实力强大的国家通过扩张实现地区霸权,来确保其安全和利益;弱小国家则可选择结盟制衡大国的威胁,否则小国只能依从大国利益,委曲求全。国家间的矛盾冲突主要来自“安全困境”和错误认知。安全困境是指国家间为争取安全而面临的一种两难情况。一方面,一国为实现安全而增加实力;但在其他国家的眼里,这是对其国家安全的挑战。因此,其他国家会增加安全投入,以保持平衡。另一方面,由于其他国家军事实力的增强,该国安全将面临着比以往更为严重的军事威胁。此外,安全困境所导致国家间的错误认知,往往成为国家间冲突的

^①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1979);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征 稿 启 事

《国际政治科学》致力于推进国际政治的科学研究,主要刊登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论文,重视国际安全、中国周边地区、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对外政策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欢迎其他相关领域的稿件。

《国际政治科学》基本上选取研究性的学术论文,特别欢迎包括问题提出、文献回顾、逻辑推论和经验检验等程序完整的科学论文,对于学术性强的评论文章本刊物也适量刊登。本刊提倡编写方法规范,望作者参阅本刊注释体例。

《国际政治科学》不以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作为科学与否的标准,因此对于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论文予以同等重视。

来稿字数在 1.5—2.5 万字之间(不包括注释),并请作者提供 250—300 字的内容摘要和 200 字左右的作者简介(包括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学术成果及所在单位、职务、职称及电子信箱等)。

收到稿件后,本刊编辑部将约请相关问题领域的三名专家对稿件进行匿名评审,提出评审意见;并于收到稿件的两个月内通知作者是否采用。如果采用,编辑部将向作者提出修改意见。

来稿请将电子版寄至 chenqi@mail.tsinghua.edu.cn;也可将打印稿寄至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新斋 246 室《国际政治科学》编辑部(邮编:100084)。

《国际政治科学》2005 年全年总目录

第 1 期

孙学峰
周方银
陈 琪
许田波
王学东
石之瑜

中国对美政策的战略效应	1
小国为何能长期存在	24
经济区域化对东亚和平的意义	48
大一统对抗制衡	78
国家声誉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	106
英国学派与两岸国际关系研究	132

第 2 期

阎学通
江忆恩
朱毓刚
郭 钢
周宝根
秦亚青

中国崛起的实力地位	1
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	26
国际法和国际政治中的分离主义	68
政府更替对国际谈判的影响	86
两党政治下的美国军控政策	108
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其批判	138

第 3 期

罗纳德·塔门
亚采克·库格勒
封永平
徐 进
邹明浩 李 彬

权力转移与中美冲突	1
认同变迁:英美权力的和平转移	21
军事技术变化与军事战略转型	44
美国军事转型对国际安全的影响 ——攻防理论的视角	73
论全球化进程对国家主权的建构	93
结构现实主义是个体主义吗	119

陈昌升
宋 伟

第 4 期

冯惠云
漆海霞
韦宗友
钟振明
刘 丰 张睿壮

防御性的中国战略文化	1
国际斡旋的成败分析	24
霸权阴影下的战略选择	52
冷战后北约何以继续存在	82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辨析	109

国际政治科学

2005 年第 4 期(总第 4 期)

目 录

II	作者简介	
IV	编者的话	
1	防御性的中国战略文化	冯惠云
24	国际斡旋的成败分析	漆海霞
52	霸权阴影下的战略选择	韦宗友
82	冷战后北约何以继续存在	钟振明
	学术评论	
109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辨析	刘 丰 张睿壮
133	注释体例	

防御性的中国战略文化

冯惠云

越来越多的人在讨论中国崛起的世界影响。在这些讨论中,有两种理论视角值得我们关注,即结构现实主义和文化现实主义。信奉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学者认为,中国会如以往的大国一样,通过领土扩张达到国家崛起的目的。中国将在未来挑战美国霸权,以武力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最终试图通过战争改变国际体系现状。因此,即使目前中国的国力还不够强大,但崛起的中国仍是未来国际体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必须现在就加以遏制。信奉文化现实主义理论的学者则强调中国战略文化对中国外交决策和国家战略的影响。他们指出,中国有人文儒家和极端现实主义两种战略文化,但前者在中国战略决策中不起决定作用,极端现实主义文化(Realpolitik-Parabellum Realism)才是中国战略文化的主要特征。在极端现实主义文化的驱动下,崛起的中国将会成为未来战争爆发的焦点。虽然两种理论分析中国崛起影响的角度不同,但却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中国崛起将挑起战争,现在就必须开始遏制中国。

在批评以上两种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利用政治心理学中的行为代码量化分析方法提出了“中国战略文化防御论”的观点。所谓行为代码分析,是以决策人的公开讲话为研究对象,通过计算机对文本中动词进行量化分析与对比,科

《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总第4期),第1—23页。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学地分析、预测决策人的战略文化取向。通过分析中国领导人在战争与和平状态下的信念体系变化,本文认为,中国的战略文化为防御性,中国领导人的外交决策倾向于维持和平,而非挑动战争。

全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结构现实主义和文化现实主义理论有关中国崛起的主要观点,剖析两种理论的缺陷和不足。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战略文化理论在国家战略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并提出论文的主要假设——中国战略文化防御论。第三部分介绍政治心理学中的行为代码研究方法。第四和第五部分分别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和平和战争环境中的行为代码进行量化分析,以检测本文的研究假设。第六部分是结论部分。

一、两种现实主义理论的主要缺陷

作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旗帜,现实主义理论有很多分支。本文主要分析为西方“中国威胁论”提供理论依据的两种现实主义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和文化现实主义。

结构现实主义强调国际体系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沃尔兹(Kenneth Waltz)的新现实主义理论、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和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霸权更替理论。^①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体系内的每个国家都要依靠自助的方式保障安全。要生存,就要保存实力,因为实力的大小是国家间的主要区别。实力强大的国家通过扩张实现地区霸权,来确保其安全和利益;弱小国家则可选择结盟制衡大国的威胁,否则小国只能依从大国利益,委曲求全。国家间的矛盾冲突主要来自“安全困境”和错误认知。安全困境是指国家间为争取安全而面临的一种两难情况。一方面,一国为实现安全而增加实力;但在其他国家的眼里,这是对其国家安全的挑战。因此,其他国家会增加安全投入,以保持平衡。另一方面,由于其他国家军事实力的增强,该国安全将面临着比以往更为严重的军事威胁。此外,安全困境所导致国家间的错误认知,往往成为国家间冲突的

^①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1979);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导火索。新现实主义还认为,生存安全是每个国家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中所能追求的最高目标,所以大部分国家希望保持现状。

新现实主义认为,崛起的中国现在正处在安全困境之中。由于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中国的崛起必然引起其他国家的警惕和担忧。因此,其他国家将试图通过联盟或增加各自军事实力的方式来平衡中国实力的增长。但中国则会把这些国家追求实力平衡的行为视为对其安全的挑战,从而被迫采取激进措施,借助武力争取生存安全。无论是台湾问题还是中美关系,都有可能成为中国卷入战争的导火索^①,因此,中国的崛起将威胁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安全。

20世纪90年代末,新现实主义理论派生出了新的分支,即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②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生存安全仍是国家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但实现安全的唯一手段是最大限度地增强军事实力。在国际无政府体系下,只有最具实力的霸主才能够保障绝对安全。因此,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最好的防御战略是采取主动进攻。即使本质上是维持现状的国家也会尽力增强军事实力,从而在行为上表现为改变现状的国家。

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崛起的中国是一个为追求生存安全而试图改变现状的国家。首先,随着国力的增长,中国将不惜使用武力来谋求相应的国际地位,以争取最大的安全。其次,军事实力的增加将激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历史上被西方列强进攻的耻辱将导致中国领导人在很多国际争端中不得不采取强硬立场,以保证获得国内的民众支持和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再次,中国国力强大后,必然寻求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台独”与领土争端问题。最后,崛起的中国会试图改变国际规则,以谋求地区霸权,从而与美国发生冲突。^③

① Alastair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2003, pp. 5—56.

②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③ Ibid., p. 4. 米尔斯海默对权力的定义突出强调军事力量而忽略了其他因素。另外可参考 Thomas Christensen, "Chinese Realpolitik: Reading Beijing's World-View," *Foreign Affairs*, Vol. 75, 1996, pp. 37—52; Christensen,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 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 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2001, pp. 5—40; Gerald Segal, "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5, 1999; Paul Dibb et al., "Asia's Insecurity," *Survival*, Vol. 41, No. 3, 1999, pp. 5—20; David Shambaugh, "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lations: From Partners to Competitors," *Survival*, Vol. 42, No. 1, 2000, pp. 97—115; David Shambaugh, "China's Military Views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3, 1999/2000, pp. 52—79.

霸权更替现实主义从动态角度分析了国家实力变化对国际关系体系的影响。这一理论指出,现有体系中的霸主是维持现状的国家,实力上升的崛起国则是现状的挑战者。随着实力的增长,崛起国必然希望改变现状,而以武力挑战既有霸主则是其树立威信的必经之路。因此,当崛起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达到一定水平时,它将不惜一切发动对霸主的战争,为其建立新的国际体系扫清道路。对于现存霸权国来说,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安全,有可能先发制人,通过战争方式遏制崛起中的国家。霸权更替现实主义认为,当前国际体系中,美国是霸主而中国为崛起的挑战者。因此,中美之间必有一战。

以上三种结构现实主义理论都把中国归类为改变现状的国家或挑战者,认为崛起的中国是国际安全和稳定的重大威胁。然而,这些理论都没有从根本上探讨两个问题:(1)为什么改变现状的国家会存在?(2)如何确定哪些国家是改变现状的国家?这三种结构现实主义理论都“假定”崛起的中国会有改变现状的战略意图,并一定会通过武力实现战略目标。事实上,这一假定是以另一假定为基础的,即假定所有国家的利益都一致。然而,不同国家所追求的国家利益实际上并不相同。尤其在文化背景下,国家利益的定义方式更是千差万别。比如,在历史上,农耕文化影响下的民族国家大多对外实行防御战略,即使存在向外扩张的机会,也不愿发动进攻。相反,游牧民族大多具有进攻性,通常以武力扩张实现国家安全。^①

基于对现实主义“国家利益一致性”假定的批评,江忆恩(Alastair Johnston)提出了文化现实主义理论。他指出,中国战略文化对国家战略的制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有两种战略文化,即儒家人文战略文化和极端现实主义战略文化。^②然而,他认为,中国的儒家人文战略文化只是中国极端现实主义战略文化的伪装。在现实决策中,指导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文化是极端现实主义战略文化。在这种战略文化的影响下,中国的国家战略实际上具有强烈的进攻

^① 金德湘:《中国的和平外交传统与西方的“黄祸论”》,《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11期,第13页。

^② 儒家战略文化和极端现实主义战略文化是相对的,两种文化对世界和未来的认识不同。儒家战略文化强调中国因文化影响不希望发生战争,认为即使在面临安全威胁时决策者也会倾向于选择外交和协商手段。如果战争不可避免,协商无效,除继续寻求外交手段外,中国也会为正义而战,但战争只是最后的手段。极端现实主义战略文化认为,世界充满利益冲突,战争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为了生存,任何国家都会在受到安全威胁时选择使用武力,中国也不例外。

性。中国不仅在历史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是一个扩张型的国家。

文化现实主义理论注意到了中国战略文化对国家战略的重要影响,非常值得肯定。然而,江忆恩的理论在选择案例、中文翻译及历史和文化剖析上都存在着偏见和曲解,导致其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即战略文化版本的“中国威胁论”^①。

正确解读中国战略文化的性质以及战略文化对中国国家战略的影响,是分析和预测中国外交战略走向的关键。为检验江忆恩对中国战略文化的分析,本文将采用政治心理学中的行为代码方法,对中国主要国家领导人在不同战略条件下发布的对外政策及公开讲话进行量化分析。客观地说,量化分析文化变量对国家政策的影响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难题。然而,由于政治心理学中“行为代码”的定义恰恰对应的是战略文化的主要因素,因此领导人的“行为代码”可用于解读战略文化对中国战略走向的影响。通过量化中国领导人决策中“行为代码”,本文旨在检验战略文化对中国领导人战略决策的影响,主要探求三个问题:(1)中国领导人的信念体系是否具有进攻性?(2)中国领导人的文化背景是否倾向于改变现状?(3)中国的战略选择是否具有进攻性?

二、战略文化与决策

战略文化是影响国家战略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战略文化的载体是战略决策人或国家领导人。简单地说,就是文化影响人,而人制定政策。文化如何影响人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本文仅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对此问题加以分析。政治心理学认为,文化影响领导人的信念体系。在成长、教育、社会化和心理认知过程中,领导人的信念体系时时受到本国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而领导人的决策是其信念和观念在特定情况下的自然反映。早期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和苏

^① Alastair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例如,江忆恩认为“Parabellum”与中国的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意思一样。但是,“Parabellum”强调为保护和平而发动进攻性战争,而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则强调做好战争准备,未必需要发动战争。由于语言文化背景不同,两者存在本质差异。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武术精神反映的也是一种防御意识。参见 Zhang Tiejun,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Traditional and Present Features,”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1, No. 2, 2002, pp. 73—90.

联领导人的决策反映了两国文化的巨大差异。理解这种文化差异对于理解危机、解决危机和缓解国家间的矛盾乃至建立合作机制都有着重要作用。

作为整体文化的一部分,战略文化直接影响国家领导人“信念体系”的形成并指导战略决策的制定。在分析战略环境和制定政策时,领导人或决策者的“信念体系”指导着其如何选择和分配从外界环境接收来的信息,并赋予这些信息文化和历史色彩。同时,信念体系也帮助决策者做出战略选择。根据认知心理学理论,领导人在接收外界信息时,其信念体系对外界环境信息的处理和政策制定有着三个方面的影响:印证性效应、指导性效应和学习效应。^①

首先,领导人制定的政策会反映和回应外界战略环境,这体现的是信念体系的“印证效应”。其次,在接收到外界信息后,领导人可在信念体系的影响下,针对信息做出判断,采取战略决策,从而引导事件的发展。这是信念体系在发挥“指导效应”。最后,领导人可能会根据以往的经历和历史实践,与现实进行比较,通过类比或学习历史经验,制定出反映信念体系“学习效应”的政策。在这方面,有关绥靖政策的研究就是较为著名的例子。^②

国际关系学中有关领导人的研究存在着很多争论,而领导人对国家政策的制定是否有决定性作用,则是学者们长期争论的焦点。现实主义理论忽视国家间的区别,不大关注国家领导人的作用。在现实主义看来,除了实力大小不同以外,国家之间的其他性质和特征都是相同的。无论谁为国家领导人,其政策只是根据外部环境情况做出理性选择的最终结果。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法西斯造成的,而是世界体系发展不均衡的结果。由于不

① Stephen Walker et al., "Profiling the Operational Codes of Political Leaders," in Jerrold Post, ed., *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of Political Leader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Walker and Schafer, "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Alex Mintz, ed., *Advances 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Yearbook* (New York: Palgrave, forthcoming).

② 参见 Ernest May, *"Lessons" of the Pa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 War: Korea, Munich, Dien Bien Phu,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s of 196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Elizabeth Kier, *Imagining War: French and British Military Doctrine Between the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Richard E. Neustadt and Ernest May, *Thinking in Time: The Use of History for Decision Maker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6); Stephen Walker, "The Motivational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Belief Syste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7, pp. 179—202; Stephen Walker, "The Evolution of 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1, 1990, pp. 403—418.

满一战后的不公平待遇,德国希望改变地位,进而挑战世界体系,最终导致二战爆发。^① 然而,国际政治心理学提出的理论强调“以人为本”,即认为领导人对国家政策的制定至关重要。领导人的信念体系是沟通领导人与外部环境的桥梁,因此分析领导人的信念体系是理解和预测国家政策取向的关键。^② 该理论认为,信念体系通过“引导领导人如何处理、解释和分析复杂不定的具体环境”来指导领袖们的行为。^③

正如温特(Alexander Wendt)所指出的,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其实是各国政府(领导人)的主观意志造成的。^④ 国家的战略决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人如何理解和回应外界信息。领导人的信念体系赋予这些外界信息不同的意义,并通过三种不同效应方式最终反馈到政策的制定上。领导人的决策往往反映出一种对应外部环境的有限理性选择,原因在于信念体系起到了“过滤”作用,使得领导人的决策不一定符合经济学模式中的最优选择,而很可能是根据环境和对手以及领导人个性特点做出的次优甚至非理性选择。^⑤

中国的战略决策走向体现了中国战略文化对领导人的影响,而中国的很多战争决策都显示出很强的儒家文化烙印。^⑥ 纵观中国历史,虽然以军事实力而言,中国向外扩张的机会很多,但除少数民族占领时期(比如,元朝、清朝),中国实际上很少借助武力侵犯邻国。^⑦ 在中国现代历史的三次大规模战争(朝鲜战争、中印战争和中越战争)中,中国的战争行为都表现出防御性的文化理念。

① Randal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② M. G. Hermann and C. F. Hermann, "Who Make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 and How: An Empirical Inqui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pp. 361—388, 1989.

③ Yaacov YI Vertzberger, *The World In Their Mind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ognition, and Perception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④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1992, pp. 391—425.

⑤ Herbert Simon,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The Dialogue of Psychology With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9, 1985, pp. 293—304.

⑥ John Fairbank and Jr. Frank Kierman, ed.,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King C Chen, *China's War with Vietnam 1979: Issues, Decisions and Implications*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6); Andrew Scobell and Larry Wortzel, *The Lessons of History: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t 75* (Carlisl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3).

⑦ 西方学者指出,汉武帝统治时期的匈奴政策反映出中国战略文化的进攻性,而中国对越南的进攻历史更是长达一千年。